

※ 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 ※

緬懷恩師高友工教授

蔡宗齊*

「恩師」是學生表達感激之詞，對我而言，如果沒有恩師——高友工先生，就沒有自己學術的長進，這不是客套話，而是肺腑之言，老師於我恩重如山。雖然在高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只有短短三年的時間，但老師對自己學術和生活的影響卻是終生的。

我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，一九七七年考入中山大學外文系英文專業，一九七九年接著考入該系首屆研究生，攻讀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。一九八一年碩士畢業，我開始在廣州外國語大學教書。在一九八三年間極左勢力發起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，對理論界和文藝界進行大規模的整治，我感到心灰意冷，產生了報讀美國大學的想法。於是將申請資料連同碩士論文寄到幾間學校，隨後收到了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（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）錄取通知及全額獎學金，開啟了留學生涯。

一九八七年，我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，師從高友工教授，改修中國古典文學，從而開始了治學的一個新階段。這次改變專業，無疑是個人學術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，但卻非經過長期深思熟慮而做出的決定，而是無心插柳成蔭之事，完全由偶然緣分所致。八七年間我通過了麻省大學的博士資格考試，同時又被普林斯頓、史丹佛、哥倫比亞大學錄取，而且都給了全額獎學金。我當時對西學興趣甚濃，期待在英美文學、西方文學理論的領域中繼續深造，完全沒有考慮專修中國文學。

最終拜入高先生門下，應該說是一種註定的緣分。記得一九八七年四月裏的一日黃昏，我從學校回到住處，突然接到了高先生的電話，先生給了我推心置腹的

* 蔡宗齊，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、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。

建議：「雖然你申請的是普林斯頓的比較文學系，但若希望留在美國，不如去東亞系。美國現在正在興起中國文學研究，你是大陸培養出來的，有一定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素養，又在麻省大學得到了很好的西方文學理論薰陶和訓練，非常適合在漢學界發展。」當時國內研究狀況並不如意，我沒有回國發展的打算，於是當即接受高先生的建議，決定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深造。之後方才知道高先生其實並不會輕易邀請學生拜入門下，我很可能是少有的一個例外。而這一切源於鄭清茂教授的大力推薦。鄭教授是高先生的好友，也是我在麻省大學的老師。鄭教授事後告訴我，我請他寫的那幾封推薦信，除了給普林斯頓大學的那一封之外，全部沒有寄出，但在臺灣與高先生見了面，並叮囑道：「這個學生你一定要收。」

進入普林斯頓之後，高先生對我特別關照。記得一日，課堂內容為〈古詩十九首〉，課前我同老師談了談自己的想法——以文本細讀的方法歸納〈古詩十九首〉的抒情結構，並與《詩經》的比興結構相聯繫。先生很感興趣，立刻讓我在課堂上發言，之後又將這篇論文推薦到《中外文學》，這是我第一篇以中文發表的文章。從此高先生對我的學術指導就特別頻繁，每次上課前後我們都會有近一個小時的交流，而這些交流令我終身受益。首先，它推動我完成了由英美比較文學至中國古典詩學的研究轉向。老師一直強調，若想真正在漢學方面有所成就，必須對中國古典文化有深入的理解，而不能用中國材料生搬硬套西方理論。於是攻讀博士期間，我對中國傳統詩歌、佛教、經學等內容進行了惡補，完成了學術的轉向。其次，高先生提出學術問題與觀點，總是獨樹一幟，非常強調原創性，耳濡目染之中，我的研究理念進一步鞏固：學術的靈魂就是原創，一個人如果不能提出新鮮的觀點，對學術沒有獨創性的推進，不如不寫文章。雖然在老師門下只有三年，但離開學校後，我始終堅守這樣的初心，且一直未變。最後，通過修讀高先生的課，我的視野被徹底打開，此後寫論文能夠打破文本細讀的局限，從更為寬廣的理論層面探討問題。

我的博士只讀了三年，其實離校時論文只完成了一章，但因為先前發表過英文文學方面的論文，三個學校都給出了聘書，而當時我持的是 J-1 簽證，為了解決留美的身分問題就提前離校了。畢業後，我去了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比較文學系任教，並於第一年寫完了博士論文。出於工作需要，在石溪分校我寫了一些比較文學類的文章，經過普林斯頓三年的訓練，這時的比較研究不再限於相同之處，而能擴展到對不同性及其傳統的闡釋。

一九九三年，我再次回到東亞系研究中國傳統文學，其實也源於高先生的幫

助。當時我太太在普林斯頓藝術系擔任幻燈組的負責人，一次在火車上遇到高先生，先生說：「伊利諾有一份工作，不知道宗齊有沒有興趣？」於是在老師的推薦下我遞交申請，通過競爭成為首選、得到了這份工作，由此回到了中國詩學研究的領域。

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，在其門下的短暫時光裏你未必能夠察覺，離開以後它像空氣一樣孕育著你的成長，直至某日的某一瞬間，這種力量突然爆發在你眼前，點亮你的火花，成就你的光芒，我想這就是大師的魅力。博士期間所寫的《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》，是以文本細讀的方法重構詩歌演變的內在脈絡，探討詩人如何運用愈發複雜的形式來表現自我。這本書受了高先生的影響，運用了一些現代西方文學批評的理論，但嚴格來說不是特別明顯。真正繼承發展老師理論的研究，應當始於二〇〇四年我在伊利諾組織一個學術會議所編寫的《如何讀中國詩歌》。這本教材末篇需要一個理論總結來陳述中國詩歌藝術的精髓，在醞釀思路時，突然回憶起高先生曾指出，題評句與主謂句是中國詩歌的抒情基礎，於是我通讀了各種詩體的代表性作品，發現從語言角度能夠解決其他方法無法詮釋的問題，能夠揭示出各種詩體境界的語言基礎，由此豁然開朗。相比《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》，我正要完成的《語法與詩境》一書更接近高先生的思想，它試圖以高先生的理論為基石，建構中國詩歌藝術的系統。網上有些學者認為，高先生的研究設想很大而論述不夠，甚至稱之為戲論，我認為他們可能並未理解高先生的理論精髓，亦未認識到先生提出大問題的意義。我深深體會到，雖然老師的指點看似籠統，但若沒有這種指點，我難以找到後來的研究路子，所以我對老師心懷無限感激。

我想，對老師最大的恭敬，也許是爭取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老師的理論，於是我向著這一目標，沿著同時性與歷時性研究的兩條軸線上做出了努力。在同時性方面，我將詩歌的研究從句法擴展到節奏和結構。我撰寫了一系列的論文，對《詩經》、五言詩、近體詩、小令、慢詞各自特有的節奏做了系統的描述，並考慮這幾種節奏如何影響句法。高老師主要講主謂句，而我則試圖將題評句 (topic+comment sentences) 與主謂句並列，句法與章法並置；探索句法如何影響章法，再將這種語言分析與傳統直觀式的批評方法做對照，嘗試與古人溝通。在歷時性方面，老師對詩歌形式的分析，集中於唐詩和早期五言詩，我試圖擴展到所有主要的詩體，梳理出中國詩歌節奏、句法、結構、詩境發展的總體脈絡。

雖然九一年就離開普林斯頓，但之後若有任何學術成果，我都會向老師報告，

一直視老師如父親。先生總是教導：「作為一個學者不光學問要好，為人也得有道德，沒有道德底線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。」亦時常強調謙卑的重要：「杜甫這麼偉大的人，人生都這麼坎坷，我們凡人有什麼可抱怨呢？」雖然成為老師那樣超脫世俗的奇人非常難，但我們這些學生對於權力之慾都十分之淡，一切涉及權力的行政工作能推必推，專心於學術研究。我的父親臨終時對六個子女留下這樣的遺訓：「名利如浮雲，不要孜孜以求。我不希望你們一鳴驚人，只希望你們清清白白做人，踏踏實實做事，不求出名，只求扎扎實實生活。」對於這一致的父訓與師訓，我一直默默堅守著。

人生之中能夠遇見高先生這樣的恩師，是我莫大的幸運。先生離去，惆悵之情難於言表，同時也倍感人生短暫，惟繼續勤勤耕耘於自己熱愛的學術事業，做出更大的貢獻，方得以回報師恩！